

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高 铮

2005年4月23日，著名华裔学者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教授病逝于卢森堡，享年76岁。

弗兰克对拉丁美洲有着深入的研究，是依附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依附论学说在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拉丁美洲，主要是在对第三世界不发达问题的探讨和辩论中形成的，后来也被非洲和亚洲学者以及一些西方激进学者所接受。依附论着重从宏观角度探讨拉美等第三世界的不发达，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批判传统的发展思想、尤其是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化理论，强调拉美和第三世界的不发达根源主要是由于受到来自美国等西方大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弗兰克在1966年发表的《不发达的发展》（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或译“低度发展的发展”）一文的命题，成为分析第三世界发展问题和经济增长中依附性问题的名句，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弗兰克认为，在“宗主—卫星”（或“中心—外围”）国际格局下，第三世界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自主发展，其发展只能是“不发达的发展”，换言之，就是越发展就越不发达。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受到依附性地位的制约，只有同宗主中心的联系削弱才能取得真正的增长，因为它们的不发达是由于被结合进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系而造成的。他认为，“当代的不发达状态主要是不发达的卫星国和发达的宗主国之间过去和当前政治、经济等关系的历史产物，这种关系正是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整个结构和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发达状况不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早期或传统阶段，目前的发达国家过去虽然可能经历过“未发展”状态，但决不是“不发达”状态。不发达和发达都是同一个历史进程所造成的。他说，不发达国家不能靠发达国家资本、体制和价值观的扩散来取得发展，而惟有摆脱这种扩散关系来取得发展。这种“宗主—卫星”结构并不局限于国际范围，而且也层层渗入、影响到不发达国家的国内关系。所以，认识资本主

义的全球性扩张、垄断性结构和不平衡发展及其对不发达世界的持续影响，将有助于不发达国家的人民了解他们不发达的发展与发展的不发达，并改变这种现实。

弗兰克1929年生于德国。父亲是一位犹太作家。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父亲为了逃避纳粹统治，在弗兰克年仅4岁时举家迁往瑞士，父亲则去了美国好莱坞以写作谋生。弗兰克在瑞士度过童年，1941年赴美国上中学，在斯沃思摩尔学院学习，同时在木材厂等一些工厂干活并从事各种低工资服务工作。后入芝加哥大学学习经济学，1957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研讨的是乌克兰农业问题），但他强烈反对他的货币主义导师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学派理论。毕业后在多所美国大学任教。1960年他访问古巴，后去加纳和几内亚。1962年再去拉丁美洲，在智利与马尔塔·弗恩特斯结婚。马尔塔从事社会运动，主张社会正义，弗兰克曾与她合写一些研究分析拉美社会运动的著作。弗兰克在拉美先后任教于巴西利亚大学（1962~1965）、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1965~1966）和智利大学（1968~1973），深入研究拉美问题并投身社会运动，他关于依附论的思想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他积极参与智利阿连德领导的改革活动。1973年皮诺切特军事政变后，弗兰克与妻儿被迫流亡德国。弗兰克在《每月评论》等杂志发表的文章观点被资本主义统治阶级视为“危险言论”而被美国司法部长宣布禁止入境（直到1979年波士顿大学一次研讨会邀请他出席时才得以解禁）。他在欧洲先后在德国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1973~1978）、英国的东英吉利大学（1978~1983）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1981~1994）任教和进行研究工作。在这一时期，弗兰克除继续关注拉美问题外，开始更多地研究资本主义全球危机、新自由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的失败。1993年妻子马尔塔病逝。他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研究所工作达10多年，直到1994

年退休。此后他在多所美国大学和加拿大大学工作。总起来看，他曾先后在9所北美大学、3所拉美大学和5所欧洲大学任教和研究，在全世界各地各种机构和会议上作过无数讲话和报告，他的观点和学说影响广泛。2003年弗兰克与艾莉森·坎德拉结婚，她在弗兰克一生最后的几年里全力支持他的工作和护理他的生活。

弗兰克关注与研究的领域广泛，他对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世界史、发展理论、发展中国家与南北关系、拉丁美洲问题、资本主义发展史、世界体系、世界经济政治与国际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有着深刻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对资本主义社会持尖锐批判态度，反帝、反殖、反霸立场鲜明。他思想敏锐，著作极为丰富，一生著书40多部，文章1000多篇。

弗兰克在60年代中期发表的《不发达的发展》(1966)和另一篇论文《发展的社会学与社会学的不发达》(1967)，以及专著《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不发达》(1967)使他获得了国际声誉。

他的著作还包括：《依附论》(与斯威齐、多斯桑托斯和奥康纳合著)、《拉丁美洲：不发达还是革命》(1969)、《发展的社会学与社会学的不发达》(1971)、《流氓资产阶级：拉丁美洲的流氓式发展，依附性，阶级与政治》(1972)、《依附性与不发达：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学》(1972，与科克罗夫特和约翰逊合著)、《论资本主义的不发达》(1975)、《智利的经济“种族灭绝”》(1976)、《思考新的世界经济危机》(1976)、《世界性积累，1492~1789》(1978)、《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1978)、《墨西哥农业，1521~1630：生产方式的转型》(1979)、《世界经济的危机》(1980)、《第三世界的危机》(1981)、《全球危机的动力》(1982，与阿明、阿里

吉和沃勒斯坦合著)、《欧洲的挑战》(1983)、《批评与反批评》(1984)等。从这些书目中可以看到弗兰克前期学术生涯的大体轨迹。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弗兰克更多地关注世界历史和世界体系的研究。这个时期的著作包括：《改变革命：社会运动与世界体系》(1990，与阿明、阿里吉和沃勒斯坦合著)、《中亚的中心地位》(1992)等。弗兰克在世界体系的研究中意识到东、西方在1492年以前就已存在于同一世界体系之中，世界体系内部欧洲部分的变化是和整个体系的其他部分密切相关的。他在这段时期中的许多论文都在探讨这些问题，这些努力和结果充分体现在1993年出版的《世界体系：500年还是5000年？》(与巴里·吉尔斯合著)。随后，弗兰克进一步把研究目标集中于1400~1800年的全球经济，在1998年发表了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重新面向东方》(中文版译名为《白银资本》)，他把这几个世纪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作了新的论述，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把中国(和印度)置于亚洲的中心，认为中国在世界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极为突出和积极的地位。弗兰克认为，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的同时，自身并没有跳出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此书提出了许多挑战性的问题，在学术界有很大反响，在1999年获世界历史学会大奖。这反映国际学术界对于弗兰克追求学术真理和执着治学态度的高度赞扬。弗兰克不顾多年的癌症疾患，始终笔耕不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病床上写作《重新面向东方》一书的续篇：《重新面向东方，19世纪》，该书已接近完成，有望由其友人安排出版。

弗兰克留下的学术遗产与追求真理和不断创新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纪念。